

分类号：A811；B829

单位代码：10363

密 级：公开

学 号：2211510109

题 目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研究

英文并列

题 目 Study on Ethics 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学生姓名： 李 东

指导老师： 方前移

专 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01)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论文答辩日期： 2024 年 5 月 29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_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研究

摘 要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紧扣时代发展命题,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和中国新时代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由此产生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结合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形成的又一理论产物,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硕果。通过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系统学习和分析,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伦理思想集大成的创新,有助于拓宽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思想的外延。

本文研究由四个部分构成,基于复杂的时代背景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孕育的理论和现实渊源进行深度分析,从生产伦理、市场伦理、分配伦理以及消费伦理维度深刻而详尽地解析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内容,并且阐释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介绍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针对国内外经济伦理相关观点进行梳理和评述,并对经济伦理及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着重分析了研究创新点以及面对的难点和研究不足。

第二部分重点从产生背景、理论渊源以及实践基础三个层面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背景和渊源开展研究。首先,针对复杂国际背景以及国内背景两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次,分析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理论来源,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经济伦理观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以及蕴含在中国优秀文化中伦理观点的吸收和借鉴三个方面分析,着重阐述习近

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理论渊源。最后，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建设目标方面揭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内容，主要从践行人民创造的生产伦理观、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市场伦理观、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分配伦理观以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观四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四部分重点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意义，着重针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进行了阐述。

最后，针对全文研究进行系统化的总结和概括。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我们应该根据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发展机遇，围绕经济发展目标，全面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经济伦理，经济发展，道德

STUDY ON ETHICS 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leading collective of the CPC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the core has correctly understood and grasped the internal law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losely followed the top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onsciously combined Marxist economic ethics with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us produced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The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concept is another theoretical product formed by closely combining Marxist theory with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practice, is a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rough systematic learning and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ethics and broaden the extens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rigins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was deep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complex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cont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was deeply and thoroughly analyzed from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market,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ethics,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was explained for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was introduced in the first part. Relevant views on economic ethics were summarized and commente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concepts and connotations of economic ethics and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were defined,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points, difficulties and shortcomings faced.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studying the background and origins of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from three levels: background,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logic. Firstly, a detailed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mergen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in both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texts. Secondly,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are analyzed, mainl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conomic ethics perspective contained in Marxism, economic ethic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bsorption and reference of ethical perspectives contained in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The theoretical sou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is emphasized. Finally, the practice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was revealed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goal of building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nomic power.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the basic cont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mainly elaborating on the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from four aspects: practicing the production ethics created by the people, clarifying the market eth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emphasizing principles and flexibility in distribution ethics, and adher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onsumption ethics.

The fourth part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and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were elaborated.

Finally, a systematic summary and summary of the entire research was provided. Faced with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new domestic development trends, 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laws and opportunit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XI Jinping's economic ethics, comprehensively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r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Li Dong (Marxist theory)
Supervised by Fang Qianyi

KEY WORDS: 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economic eth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ality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2
1.2.1 研究现状	2
1.2.2 评述	7
1.3 概念界定	7
1.3.1 经济伦理	8
1.3.2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	8
1.4 研究结构及研究方法	9
1.4.1 研究结构	9
1.4.2 研究方法	10
1.5 创新点、研究难点及不足	10
1.5.1 研究创新点	10
1.5.2 研究难点及不足	11
第 2 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背景和渊源	12
2.1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12
2.1.1 国际背景：国际环境复杂、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	12
2.1.2 国内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新时代阶段	13
2.2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14
2.2.1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14
2.2.2 继承和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15
2.2.3 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17
2.3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实践基础	18

2.3.1 基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18
2.3.2 基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19
2.3.3 基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奋斗目标	20
第3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内容	21
3.1 践行人民创造的生产伦理观	21
3.1.1 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生产伦理	21
3.1.2 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的生产伦理	22
3.1.3 秉承质量效益并重的生产伦理	23
3.2 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市场伦理观	25
3.2.1 凸显市场主体作用的市场伦理	25
3.2.2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伦理	27
3.2.3 破解政府市场关系的市场伦理	28
3.3 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分配伦理观	29
3.3.1 体现全民共享的分配伦理	29
3.3.2 彰显分配正义的分配伦理	31
3.3.3 兼顾公平效率的分配伦理	32
3.4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观	33
3.4.1 倡导生态和谐的消费伦理	34
3.4.2 倡导简约适度的消费伦理	35
3.4.3 倡导绿色低碳的消费伦理	36
第4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意义	37
4.1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理论贡献	37
4.1.1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时代生命力	37
4.1.2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特质	38
4.1.3 理清了经济和伦理之间的关系	38
4.2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实践价值	40
4.2.1 补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0
4.2.2 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0
4.2.3 助力世界各国开辟经济发展新局面	41
总 结	43

参考文献.....	44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48
致 谢.....	49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马克思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马克思明确表明了道德或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形态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道德或者伦理的产生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经济伦理也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产生，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2]由此说明了经济与伦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与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观将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改革，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破除经济发展的弊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经济增速始终处于世界主要国家前列，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在先进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得以实现的。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度向着高质量逐渐转变，并且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必须做出新的变革，包括经济转型、经济结构优化等，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攻坚期。^[3]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新高度，在不同场合均着重强调我国现阶段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此期间，习近平关于经济伦理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看法、新论断，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其经济思想在伦理领域中的集中体现，通过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得以广泛运用，并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新时代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之一。我国虽然取得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面对新问题、新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研究和探索，将其充分地运用在社会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1.1.2 研究意义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本着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着想的出发点,引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实践证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全球各个经济体的发展也具备深刻的借鉴意义。本文就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复杂时代背景以及渊源进行深度分析,从生产伦理、市场伦理、分配伦理以及消费伦理角度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具体内容,最后阐释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包含的经济伦理观点,以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和谐提供理论指引。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作为新时代先进的伦理理论,时基于马克思关于经济伦理的论述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并且将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精髓进行充分地融合,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作为新时代先进的伦理理论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伦理思想集大成的创新,有助于拓宽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思想的外延。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1.2.1 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在经济伦理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本文通过检索和整理与经济伦理相关的专著、期刊、报纸等文献资料,从市场伦理,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以及消费伦理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研究现状。最后,通过对比分析评述目前经济伦理的研究现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参考。

(1) 关于生产伦理研究

关于生产伦理的理论研究主要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实际,聚焦于如何处理质量和效益关系的问题,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杨臣华(2017)提出,习近平经济伦理意蕴是基于新发展理念,为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协同提供了伦理指导。^[4]龚天平(2019)认为,生产伦理的第一诉求是兼顾“效益优先”和“质量第一”。“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生产伦理诉求最明显的体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面,供给体现的是生产、需求体现的是消费,而且其内在相互依存,紧密关联,互为前提。供给侧结

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供需平衡规律,这种高质量、优效益的生产伦理有助于促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快速实现,满足了生产和供给需求。^[5]王坤岩(2022)认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生产活动的伦理要求,适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高质量的经济生产活动必须以经济发展规律为指导,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研究以天津经济发展为案例,认为天津经济工作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紧抓质量和效益,严守新发展理念,加速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培育科技创新的新动能,这体现了质量和效益兼顾的生产伦理。^[6]何军明(2023)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了人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历史的前提在于“生命个体”,且不以人的精神和意志而改变;历史发展的基础在于物质生产活动,社会物质存在是人的实践成果。人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所以社会生产主体是人民群众。^[7]杨振家(2023)认为,习近平关于科技强国的重要论断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伦理价值取向,认为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应基于问题导向的求是精神,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生产活动是由人民群众主导,创新是依靠人民群众的主动创新,人民创造是生产伦理的主线。^[8]牛小侠(2023)认为,习近平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总体趋势,解决了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创新地形成了当代科技伦理观,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主线,倡导科技伦理应该考虑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体现了为人类造福的生产伦理观点。^[9]胡洪彬(2023)认为,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进行了重要论述,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理论的论断一脉相承,体现了习近平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进,为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明确了具体行动方向。^[10]本·阿格尔(1991)提出,人们的异化消费是基于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生产的大规模扩张,生态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性思考,由此开始了对可持续生产方式的科学化研究,成为了生产伦理研究的重要部分。^[11]

(2) 关于市场伦理研究

关于市场伦理的研究内容一般是指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研究市场经济的重要方面,目前形成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靳凤林(2015)认为,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研究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研究市场伦理的基本内容,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直接照搬某种市场伦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市场和政府的伦理关系和欧美国家是迥然不同的，欧美的市场经济是追逐资本的无限扩张，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融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理念，所以我国在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伦理关系上具备中国特色。^[12]乔洪武（2017）认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首先摒弃了传统计划经济伦理，其次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指导“看不见的手”，最后推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形成合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13]赵晓宇（2019）认为，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是密切相关联的，市场伦理产生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伦理的参与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市场道德伦理保障了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市场伦理道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14]刘紫瑶（2019）认为，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重大经济命题有助于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关系。^[15]李婕妤（2020）认为，经济伦理是研究社会经济活动视域下的伦理道德思想，包括其评价规范和标准等，并且可以用于指导经济实践活动。^[16]张彦（2022）认为，我国市场主体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环境因素影响，压力巨大，但是可以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为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17]姜涛（2022）认为，习近平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做出很多论断丰富了市场伦理，包括如何正确认识并有效处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概括为“两手论”。^[18]方字菲（2023）认为，传统的公共利益理论已经证明了“市场失灵”的存在，也证实了市场需要政府发挥监管作用，同时分析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引导机制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19]党方圆（2023）认为，如何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学界一直在努力研究的课题，如何发挥二者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也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我国也在不断探索政府和市场伦理关系，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经济伦理指导和依据。^[20]尤里·塔夫罗夫斯基阐述了对习近平中国梦的理解，认为中国梦作为一种创新思想突破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对立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根本指向。^[21]弗兰·赛斯科（2015）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包含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和融合，把个体发展和国家发展相互融合，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中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以及市场的主体作用，强调了政府宏观指导下的共同富裕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深刻体现了市场伦理观。^[22]科勒·迪科提出“Chinism”概念，即“中国主义”，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现了“天人合一”和“阴阳”等古典思想，是从方法论角度对“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伦理

的高度凝练,采用特定的价值观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尤其是其中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处理的有效机制是对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化具有包容性,体现了经济和谐发展的道德伦理要求。^[23]

(3) 关于分配伦理研究

关于分配伦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分配公平、正义以及兼顾效率的伦理意蕴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强以华(2016)提出,将“经济”与“伦理”契合成一个学科需要兼顾经济效率和伦理美德,体现在分配伦理中就是“经济分配的正义性”,分配正义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和保证社会公平,两种因素的有效结合能够体现分配正义。^[24]刘喜珍

(2018)认为,分配伦理的基点在于分配正义,关于分配正义的伦理关系包括很多层面,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平等和利益之间的伦理关系,其次是分配制度的正义和正义落实之间的伦理关系,最后是分配正义应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分配补偿,以凸显分配公正,分配伦理除了正义性,还需考虑效率,二者结合才是分配伦理的具体要求。^[25]王立(2018)认为,“应得正义观”和“平等正义观”是对立的,但在批判平等正义观时,应得正义观是无法扮演分配正义的角色,因为应得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制度性约束,所以只能作为批判性的道德标准,体现在“制度应得”的层面。^[26]孙春晨(2021)认为,公平的社会分配需从收入来源正当性出发,要在判断尺度和伦理准则方面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由社会全员共享分配利益;在效率层面还需根据生产要素投入数量以及贡献进行分配,但是由于部分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扭曲了公平性,偏离了公平和共富原则,因此在私营企业的分配伦理中需要监管机制的指导作用,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

^[27]阳芳(2022)认为,收入分配正义伦理是社会分配中必须遵循的底线原则或者最低标准,该伦理原则要求政府在分配中负有宏观指导责任,确保社会弱势具备优先分配地位,而且应尽量将社会利益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28]王竹君(2023)研究了第三次分配的伦理意蕴并提出了具体的实现方式。所谓第三次分配是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慈善,其体现的伦理意蕴是公平正义,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第三次分配的实现需要政府、社会 and 个人的参与,其表现的伦理意蕴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形式。^[29]钱周伟(2023)认为,社会分配和资金、机会、权利等很多因素都密切相关,分配应体现效率原则,也就是根据生产要素参与水平决定分配机会,其核心概括为公平和效率的兼顾。^[30]彭敏(2024)认为,

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公平正义一直被人类社会设定为长期理想，是分配伦理的衡量标准，高质量发展的旨归也在于社会公平正义。^[31]

（4）关于消费经济伦理研究

关于消费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绿色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乔洪武（2016）认为，从消费伦理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是一种适度消费理念的实践，体现了个性化、公平、适度的消费伦理。^[32]杨卫军（2018）认为，绿色发展观是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生态价值，习近平绿色生态发展的观点体现了先进的消费伦理。^[33]胡立法（2019）认为，习近平的消费伦理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主线，包括了环境道德和消费道德兼顾的可持续性消费伦理观。^[34]孙莹（2019）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伦理困境，包括缺乏低碳消费理念、不科学的能源消费结构、低碳消费创新性不足、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备等。^[35]古璇（2020）认为，习近平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倡导绿色消费，并指明了绿色消费的实现途径，其提出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以及生产模式的“三个转型”贯穿始终的就是消费经济伦理。^[36]汪淑娟（2020）指出，消费伦理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和自己之间的三重关系，主要体现在消费方式、消费水平以及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如果过度追求物质生活，消费超过道德衡量标准将造成伦理困境，所以应规避消费异化，构筑健康的消费伦理。^[37]何建华（2021）认为，传统的节俭消费是由于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影响了人的消费欲望，而现代社会的节俭消费则是克制奢侈浪费。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采用科学的消费方式，对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38]陈首珠（2021）研究了消费异化的现象和特点，认为消费异化引起了不好的伦理后果，因此应从消费伦理角度，提倡健康、理性的消费方式，规避消费异化的社会倾向，引导社会形成一种适度性的消费伦理。^[39]路雪莲（2021）认为，在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下的社会消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包括消费思想、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平等，消费不能简单的从经济层面来理解，还需要从文化、价值等伦理角度深度挖掘，其伦理意蕴体现了对消费活动本身的道德判断以及选择。^[40]张尹（2022）认为，全球生态问题形势依然严峻，生态伦理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生态伦理在实践中还有待拓展，消费伦理也是生态伦理的组成部分，我国在建设高质量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将生态经济落实到经济建设中，

正确的消费伦理需要规避思想误区，需要在消费理念、消费活动以及消费制度方面进行有效约束。^[41]刘建伟（2023）认为，习近平的消费伦理提倡正义的、平等的生态观，确立了人和自然共生的互利观，这是对人和自然伦理关系进行的深刻反思，为如何处理人和自然共生关系提供了实践范例。^[42]福斯特（2006）认为马克思对于生态消费思想的认识和见解是很深刻的。^[43]海尔·米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实现了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但是其中很大程度归因于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高出口的驱动，无法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然而习近平的消费伦理观关注到了经济社会必须要实现再平衡，注重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向着消费和服务为主导的方向转化。^[44]

1.2.2 评述

通过对经济伦理观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笔者发现目前国外在经济伦理观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习近平频繁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和世界交流更加紧密，国外学者也开始深入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始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明显不足。首先，国外学界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缺乏深度，还存在很大的研究延伸空间，譬如部分国外学者多以简单引用习近平的相关论述来分析其经济伦理观，缺乏理论研究深度。其次，部分国外学者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基于我国经济的总体宏观趋势上的分析，对于我国经济实践具体层面研究的考量不足，进而影响了国外学者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认识。国内学术界关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研究依然在研究视域方面还缺乏一定的广泛性。国内学术界多从微观层面寻找了多个角度来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虽然提出了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但全面性依然欠缺。

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经济伦理以及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展开角度比较多，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基于经济活动视域下的生产、市场、分配、消费开展研究，这对本文研究思路的拓展提供一定的启迪和参考。另外，研究学者也对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的选择，包括文献研究，历史分析、比较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等。本文研究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学者的一些经典的经济伦理论述及观点，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1.3 概念界定

1.3.1 经济伦理

(1) 经济伦理定义

经济伦理是涵盖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哲学等科学性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其基本概念提出者是马克思·韦伯，主要针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发展目标、经济政策、制度、经济活动实践等从伦理学角度进行分析，以公平正义、是非善恶等作为标准评价其是否具备道德合理性，从而调节和规范经济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韦伯研究基础上，目前学界关于经济伦理的定义和内涵研究主要从福利经济学，一般伦理和经济伦理之间关系这两个视角开展。

一是从福利经济学视角评价社会均衡环境下的资源调配和福利配置是否符合道德，以此保证社会分配的最优化。这种视角使道德可以从整体层面评价社会经济、分配制度及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在客观上表达人类在经济活动方面的伦理诉求。经济伦理研究的目的不仅是为解决社会伦理问题，而且要从经济（物质）角度实现个人和社会的最大福利，即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二是从一般伦理和经济伦理关系角度进行探索。聚焦于经济活动中包含的道德、规范和原则的研究是经济领域内部体现的一般性伦理。而经济伦理则指的是经济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需遵守的道德原则以及约束条件等。

(2) 经济伦理的价值与影响

经济伦理是社会经济关系正常运行的内在约束，提供了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保障，以内在的理念和规制调整经济社会各个参与要素的发展。在不同的文明状态下，社会经济伦理的认知水平存在差异。整体上看，建设美好、高度文明的经济社会始终是人类梦想，而人类对社会经济伦理认识的水平是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而不断改进的。经济伦理不仅对经济主体的活动有影响，而且对经济本身的认识和判断影响深远，经济伦理的价值在于能够指导市场经济主体对经济发展目标、经济行为、经济体制进行正确选择。

1.3.2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现在伦理领域的集中体现。首先肯定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经济思想，习近平的经济伦理观是整体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和政策制定中。习近平的经济伦理观特色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共同富裕、绿色发展、法治和诚信、创新驱动以及全球视

野。这些理念不仅指导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路径，也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统一。其次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客观积极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科学擘画我国经济发展格局，逐渐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伦理观点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正常有序运行，维护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我国经济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内在规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深刻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特质，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具备重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1.4 研究结构及研究方法

1.4.1 研究结构

本文基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复杂时代背景以及产生的理论和现实渊源的深度分析，从生产伦理、市场伦理、分配伦理以及消费伦理视角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具体内容，最后本文又阐释了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结构如下：

第一章 绪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其次梳理了经济伦理观的研究现状，准确界定伦理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包括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经济伦理的内涵和定义等，最后点明了本文研究创新点以及存在的难点和不足。

第二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背景和渊源。首先，针对复杂国际背景以及国内背景两个方面详细分析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次，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继承和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三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理论渊源。最后，从着眼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奋斗目标揭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第三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内容。本章基于经济活动视域，阐释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内容，包括：践行人民创造的生产伦理、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市场伦理、注重公平正义的分配伦理以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

第四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意义。主要针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进行深刻解析。

1.4.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及习近平关于经济伦理的论述等相关专著、期刊、报纸等文献的搜集、整理、精读和分析，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经济伦理研究的相关成果，理清了经济伦理的研究脉络和现状，由此系统阐述分析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从而提炼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2）比较研究法

本文针对不同实践基础下的经济伦理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和比较，从中挖掘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等。通过比较分析法，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重要理论观点，尤其是经济活动视域下习近平经济伦理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明确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的现实意义。

（3）交叉学科研究法

本文借鉴和利用了哲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将哲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的相关理论融合运用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以及实践基础的研究中，分析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关于生产、市场、分配以及消费四个方面的伦理内容及其内在关联，并且科学地和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研究结合，最后深入探索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意义。

1.5 创新点、研究难点及不足

1.5.1 研究创新点

（1）内容方面的创新

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研究在学术界有很多,但是直接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研究相对较少。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来看,关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研究必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体现在内容方面的创新:一是针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体现的伦理意蕴进行深度解析,重点是针对经济活动视域下的生产、市场、分配和消费环节以伦理视角展开,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内容,为现有经济伦理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二是基于马克思对经济伦理的相关阐述,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精髓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论述进行研究切入,分析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过程,分析其经济伦理理论产生的根源,并且和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证实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发展。

(2) 研究视角创新

本文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背景,进行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紧紧抓住新时代中国社会及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从经济伦理学角度阐述习近平关于生产、市场、分配以及消费方面的伦理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术界拓宽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经济伦理理论的探索视角,所以本文在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视角选择上具备一定的新颖之处。

1.5.2 研究难点及不足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系统化、整体化的研究体系,所以开展全面的研究存在困难。首先,虽然国内学者广泛开展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研究,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亟待扩展,所以本研究缺乏可直接借鉴的研究经验和思路;其次,本文研究需要结合习近平关于经济建设的系列讲话,并且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以及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所以本文在观点融合、思想高度的把握上存在难点。另外,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短期内开展全面性研究存在难度,所以暂时采取阶段性的研究。

第2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背景和渊源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南，其产生和形成时代背景是基于国际和国内复杂形势的准确把握，是在继承马克思经济伦理观、传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观以及深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展而来，同时也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同的现实依据。

2.1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2.1.1 国际背景：国际环境复杂、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

（1）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习近平指出“当下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45]世界局部的军事冲突，暴恐事件、局部地区动荡等都频繁发生，非传统安全问题非常突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带来的深层次影响不断蔓延，尤其在全世界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的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贸易低迷，地区保护主义抬头。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正视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克服中国经济发展自身弱势，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大力开展经济建设，锚定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战略定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向好，让我们具备了面对和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能力。

（2）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世界各国积极响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形成密切合作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紧密的经济联系让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形成了既相互依赖，也相互竞争的关系，竞合关系下的科技、资金、人才以及信息等要素流动性更强，资产配置更优，经济体之间发展空间拓展性以及相互协作力增加。习近平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提出了经济发展和伦理道德和谐发展，占据了思想和道义的制高点，从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价值观、义利观等角度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伦理视角的指引，为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独特创见。

经济全球化下，习近平经济伦理观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采用了历史的、客观的、联系的观点正视全球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大市场循环，以扩大内需为主要手段，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在国内市场的作用发挥，全面吸引全球高效资源，以期构建畅通无阻的经济发展循环。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就是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3）科技信息化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量”的积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质”的提升，特别是信息科技对于各个产业和领域的发展影响更为深远，对于世界各个经济体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尤其是对于世界各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习近平将科技作为创新的根本，提出创新是从根本上影响，甚至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所以中国发展必须依托科技自立自强，进行科技创新，而科技信息化是创新发展的重中之重，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就是在科技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认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提出的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塑造科技向善的伦理观点，这成为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的科学指引。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和科技信息化发展时代密切相关。

2.1.2 国内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新阶段

中国经济建设已经步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就是来源于我国新时代的经济建设实践。习近平曾经明确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46]这段论述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是基于对整体经济形势的正确把握，关于经济伦理观的研究应以我国发展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为依据，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产生顺应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已经步入全新

的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对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索,是对中国未来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判断,是人民群众在历史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具备历史性和实践性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自从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47]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不是局限于某一领域的变革,而是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深度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48]

习近平强调,需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变化来综合考察经济建设中的生产、市场、分配以及消费之间的关联。习近平经济伦理观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是从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角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精华的提炼和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建设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动力。

2.2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产生是基于深厚的理论基础,既是把马克思关于经济伦理思想阐述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也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观点的继承吸收,同时其经济伦理观点也充分融合中国古代优秀的伦理文化。

2.2.1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从人类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还没有任何学说能够媲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以及影响传播力,其中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蕴含了的强大生命力量对于认识世界以及世界改造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作用”^[49],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根本指向和根源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论述过“道德”、“生产”等经济伦理观点,但是确实不曾明确提出“经济伦理”这一名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研究时,着重探讨了道德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曾经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50]从中可以揭示两层含义,一是道德是由经济决定的,道德不是由上

帝赐予,也不是由人的主观意识创造。道德来源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并且受制于社会经济关系;二是新的经济关系将产生新的道德关系。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动了人们逐渐摆脱封建主义旧道德的桎梏,让人们逐渐适应了资产阶级新的道德观念。但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中的利润追逐过程中,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劳资不平等,资本的贪婪本性敢于践踏人世间一切规章制度,这是对道德提出的严重挑战。

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 and 道德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深刻解答经济伦理思想,并着重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角度阐明经济对道德的决定性影响,习近平也正是在充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并且和中国新时代经济建设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经济伦理观的基本架构。

2.2.2 继承和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广泛吸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关于经济伦理的思想观点作为其理论基础,具体如下:

(1)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毕其一生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其人生信条,因此这也成为其经济伦理思想遵循的重要原则。毛泽东认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将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唯一理念和人生理想,提出新中国发展经济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毛泽东同志无论身处何地,包括艰苦的战争岁月,都始终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信念,将人民放于第一位,创新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坚持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具体体现。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吸纳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伦理思想理念,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和发展中的地位,将国家、民族和个人利益实现统一,将其运用到我国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有机统一,“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思想主线。

(2)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1]邓小平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质，社会主义是要消费贫穷，实现人民共富，而发展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要实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中体现了经济和道德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应考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邓小平理论中表现了经济和道德应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要求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过程中应该重视经济和道德统一性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提出了“按劳分配”，回答了如何合理进行社会分配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回答了如何科学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性问题。邓小平理论根源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国情，成为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3）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于邓小平理论，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强调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52]我国的社会分配机制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其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社会分配中也充分考虑到各个要素对于生产的贡献，完善了按要素进行社会分配的机制，从根源上促进社会财富积累，改善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党在十六大上针对效率和公平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解答，提出初次分配时要优先关注效率，再次分配时要兼顾公平。习近平也将“三个代表”思想作为经济伦理观的思想基础，把资源节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继续延伸并进行发展创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的分配理念，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生态文明、道德文明同步发展。

（4）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大上被列入党章，在十八大上被作为我党指导思想之一。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点，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要求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实现人和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在于以人为本，这是对人民群众在创造和发展历史过程中主体地位的肯定，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以科学方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调动群众积极参与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要求经济发展中应处理好人口、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协调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将人民主体地位以及协调、可持续发展纳入到经济伦理观中,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2.2.3 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无论任何划时代的理论“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背景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53]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文化精髓一脉相承。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在理论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上实现了融会贯通。我国古代儒家、道家等学派代表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富经济伦理观点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产生提供了沃土。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去粗取精,继承借鉴,和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

(1) 传统文化中的生产和需求的伦理观点

荀子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54]生产是以人的欲望和需求满足为主要目的,这就是荀子的“欲望论”观点,也是荀子突破孔、孟思想局限的重要体现。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人”是指有“自利心”的人,荀子提出,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人的自利心实现了利他的社会效益。荀子在人性“好利”的经济学理解中,和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思想类似,但荀子把利益和正义建立了关联,提出了“好利”需求还应合乎“礼义”的约束。荀子的经济伦理观点是从人性的欲情角度分析经济活动的本质,而且其观点注意到了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生产量与需求量应该平衡,人的消费需求就是社会生产的参照,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发展的生产伦理观点。

(2) 传统文化中的市场和政府关系的伦理观点

孟子提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55]孟子认为,物品的种类和质量存在千差万别,这是物品自然存在的道理;由于物品自身存在的差异性导致了它们的价格相差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千万倍。所以,物品的价格水平决定因素根源在于物品内在的“情”。这种思想被西汉初年奉行“黄老之学”的统治阶级所信奉,所以当时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特色的经济民生政策大力推行,充分调动了百姓积极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降低了官府

对民间经济活动的不良干预，极大地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也是政府宏观调控思想的萌芽，体现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3）传统文化中的消费伦理观点

消费伦理观点体现最为明显的学派是道家，其思想代表老庄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这种对“道”的领悟包含了丰富的消费伦理，道家认为世间万物的根本在于“道”，其存在形式就是大千世界的“母体”。由于人类生存和生产活动资源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此人类应该有所节制，不能肆意索取和浪费自然界馈赠给人类的资源，否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道家学派思想体现在消费伦理上就是要人遵守自然法则，顺应万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精华的伦理思想，是一代又一代先贤智慧的累积，体现的伦理价值意蕴意义深远。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56]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就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形势的深度认知，没有脱离对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体现了对传统伦理文化的赓续。

2.3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实践基础

2.3.1 基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7]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内外部复杂环境，以及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体现了我党审时度势，谋篇布局，新发展格局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观点。新发展格局下的分配制度需要充分发挥税收的正向调节作用，缩小群众的收入差距，尤其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以社会总体消费能力提升刺激经济活力。平衡的供给关系以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习近平经济伦理重点关注的方面，包括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供给对经济循环的推动作用。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摒弃了低成本竞争的模式，更加强调了科技创新的动能作用，以期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动力。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出了科技创新，形成了自主性的、持续

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新发展格局下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破除体制机制的运行障碍，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导。

新发展格局下，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体现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上，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57]市场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于市场具备开放性、有序性的竞争。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功能，同时强调了政府在其中发挥的制度制定、政策实施方面的规范功能，使市场在政府机制指导下发挥要素资源、产品服务的自由流动，破除部分地区的封闭和局部地区的小循环，不断畅通生产、分配、消费各经济环节，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引导地方经济和全国经济具备一致的发展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形成是根植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历史时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求。

2.3.2 基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依据之一就是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势，理清经济发展中各影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市场、分配和消费等要素之间关系的调整。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突破了现代经济学的生产层次性问题，其蕴含的丰富经济学伦理观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引。

习近平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58]2017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须遵循经济规律。高质量发展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是新发展理念，即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根本体现”。^[59]具体来说，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处理好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以及城乡均衡协调的发展等。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理顺了市场伦理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有效协调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和政府合理有度的宏观调控。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尽量提升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并保障工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贯彻“按要素分配”的方式，促使各要素所有者能够根据其贡献获得相应收入水平。而且分配中还需关注分配的公平性，处理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群众收入差距问题，同步推进“包容性增长”。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发展的可持续性，从粗放到集约、从高能耗到低能耗、从高污染到低污染等根本性的发展转型，其所包含的“绿色”和“共享”发展理念于生产力促进之间具备着内在的必然关联。“绿色”发展要求降低生产能耗，尽量利用可再生能源，把生产力中包含的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建立关联，这就体现了可持续的消费伦理；“共享”发展着重体现于改革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有力的激励了劳动者主动提升技巧和技能，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这就是人民创造和人民共享的生产伦理观的具体体现。

2.3.3 基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历史交汇期和机遇期，面对全新的历史发展形势，需要先进的理论、理念指导，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正是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的时代潮流中应运而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成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的根本性现实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0]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质”的经济发展飞跃中产生，其中包含对历史上经济伦理观点的创新继承以及对现有的经济伦理观点的创新总结。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擘画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的基本路径，认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实现不仅仅依靠政治因素，而且依靠价值、道德、伦理等观念和手段的充分运用。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目标中实现了经济伦理内容和范畴的伟大突破，从经济伦理角度透视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需要伦理引导和价值规约，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奋斗目标成为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产生的重要现实源泉。

第3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内容

实践已经证明了科学的经济思想和科学的经济伦理观是相辅相成的。经济伦理观作为经济视域下的核心主旨之一，是研究和探讨经济活动主体、经济活动本身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重要评价标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准确把握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并主动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商业伦理观、管理伦理观、金融伦理观，经济伦理社会观，经济伦理个人观等，本文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内容着重体现在经济活动视域下的生产、市场、分配及消费方面。

3.1 践行人民创造的生产伦理观

习近平生产伦理体现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关系起调节作用的伦理规则，是构成经济伦理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人民群众承担了历史创造者的角色，是历史前进的根本推动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观在生产伦理方面重点强调人民创造的生产伦理，主要体现在人民主体地位、科技创新引领、质量和效益兼顾的生产伦理观。

3.1.1 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生产伦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前进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生产实践，创造历史并推动历史发展进步。人作为主动生产行为的施动者能够充分发挥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确定了人成为生产伦理道德的主要载体和前提条件。因此，人民群众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了一切发展依靠人民，一切发展为了人民。这种生产伦理观点在我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就有了初步表现，例如统治者重视老百姓的作用，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强调了老百姓的重要作用。习近平生产伦理是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论断，以及我国古代重视老百姓作用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生产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伦理观点，重视“人”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61]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第一实践者，通过运用其丰富的智慧和创造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促进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生产实践中最活跃的个体单元，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体现在习近平生产伦理观点中可以概括为“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62]习近平生产伦理观重视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创新性劳动的重要作用，幸福是通过群众的奋斗得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学术型、技能型以及创新型的劳动者队伍，通过这些群体的主动创新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无数平凡的群众通过勤奋刻苦，努力攻坚，汇聚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人民群众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创新性劳动能力根源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体化应用上。

习近平生产伦理观从本质上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蕴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伦理主旨。显然从生产经济视域来看，习近平生产伦理观全面肯定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都是依赖于人民群众的自主创造和努力奋斗。习近平生产伦理从发展依靠人民的观点出发，强调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人民群众深入经济建设，要求在经济工作部署、政策制定实施方面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群众”^[63]这个根本立场，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观的底色。

3.1.2 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的生产伦理

首先，习近平生产伦理观重视科技和创新在生产中的重大作用。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64]习近平生产伦理观中，将“科技”和“创新”作为生产统一体，也就是说把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第一动力”二者功能融合起来，也就是要全面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在科技进步中发挥应有作用，并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和互补促进作用，把科技创新打造成为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先进的科技让人类提升了认识世界的眼界，并且具备了改造世界的强大能力，让人的主观能动性有的放矢地发挥作用，同时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生产伦理认识到了创新在科技发展的驱动作用，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人改造世界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所以

习近平在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布局中将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二者相结合，提出了创新驱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驱动创新相互融合的发展战略，以科学技术的重大革新和创新作为新的创新点，再驱动创新，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为科学研究提供生机和活力。

其次，习近平生产伦理除了重视科技创新对于生产力提升的作用，还将创新动能作用发挥的关键着眼点放置于人才这个“第一资源”上，提升了人民群众对新事物的认识程度和认识深度，充分体现了人民创造的生产伦理。通过人民群众的强大创新动力驱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创新是解决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所在，这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经验规律。同时，在大众创新驱动过程中还应树立“以创新推动创新，以发展促进发展”的思维方式，从而发挥人民创造，科技创新引领的生产伦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的驱动作用。

最后，习近平生产伦理观也解答了科技和伦理的关系问题。习近平强调：“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有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所以要前瞻性研判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65]伴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全速推进，针对新兴科技领域的伦理治理成为全球的共性问题，关于科技伦理道德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掌握科技伦理道德话语权的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在科学新发现、新技术和新突破造福人民群众时，技术的错误使用或者滥用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会给人类带来灾祸。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应保证科技本身的健康。如果缺乏正确的科技伦理思想指引，那么科技活动隐藏的风险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和复杂水平的提升而增加。如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算法歧视、个人隐私保护等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生命科学中的基因编辑、基因增强等新技术发展也隐藏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风险。习近平生产伦理根据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强调了科技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科技向善”，应依据中国的国情加强科技道德伦理治理工作，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科技伦理的最高话语权，提升科技伦理道德建设对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安全的支撑保障作用。

3.1.3 秉承质量效益并重的生产伦理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中，强调了人民创造的“质量第一”和“效益优先”生产伦理观点。习近平指出：“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

烈意识，下最大力气抓全面提高质量，用质量优势对冲成本上升劣势。要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促进公平竞争……要引导企业突出主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48]质量是科学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主体是否具备伦理道德的重要体现，反映了经济主体的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生产伦理的基本诉求在于“质量第一”，这和义务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质量在生产伦理中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要求经济主体在生产源头重视产品和服务的内在质量，主动关心产品终端使用者对质量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的经济主体是人民群众，通过人民群众的产品创新和质量管理改进的创新，对产品细节精益求精。另一方面，质量也是一种道德责任的体现，经济主体在生产中应该对产品终端使用者负责，质量第一要求经济主体应充分尊重产品和服务相关方的利益，体现了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责任担当。另外，关注质量的生产伦理也是一种道德境界的体现，对于质量的关注和保证体现了对产品消费者保持的道德尊重，这是一种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生产过程中市场主体具有一定的自利动机，但是也考虑到了和生产相关各方的利益，并将其放置于重要地位，也体现了利他的道德观念。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很多优良的市场主体都极为苛刻地坚持质量管理，保证产品生产质量，这体现了坚持质量第一的道德观念。托马斯·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曾提出：“真正以过硬的质量和服务作为经营导向的公司，的确是在竭尽所能追求完美，也真的只有靠这种强烈的信念才能把整个公司团结起来”。^[66]

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发展就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质量和效益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67]效益优先也是生产伦理基本诉求之一，与“质量第一”具备相同的重要性，“效益优先”与功利论有着相似之处。首先，从功利论伦理来看，效益是生产中的一种“善”，效益的后果是评价生产是否具备道德价值的标准，所谓效益行为的后果指的是最大化的效益水平和最小化的效益损害。在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是通过人民的创造和创新实现产品和服务效益的最大化。其次，功利论伦理对平等、公正等道德因素也非常重视，但是最强调的因素还是效益，将效益最大化摆在首位，而道德因素则置于效益之后，受效益支配，所以功利论中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效益还具备优先化。但是习近平生产伦理所指的效益优先面对的是社会多数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生产中，劳动群众作为最多数的

群体是拥护社会生产的最绝对多数的力量。那么效益最大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包含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在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是,通过人民的创造和创新让产品和服务不仅具备经济效益,还具备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即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效益。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生产伦理在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实践中有很多的具体体现,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指出:“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问题不解决,只刺激需求,经济拉不上去,即使短期拉上一点,也不可持续。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68]市场经济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基本面,供给强调的是生产,需求强调的是消费,二者存在内在关联,互为条件。没有充足的供给则无法实现必要的需求,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则无法推动生产供给的创新。供给和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同,需求关注的是总量性问题,供给则关注的是结构性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供给和需求都面临着困境,供给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在生产中包括产能过剩,关键领域需要进口,农产品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等方面,部分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有效供给。经济实践表明,我国经济产能过剩并非需求不足所致,而是供给没有跟随需求变化而变化,导致生产供给无法有效满足消费需求,没有将“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生产伦理放置于经济生产的优先位置。习近平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生产中通过人民创新实现高质量、优效益的生产伦理,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低水平供需平衡跃升至高水平供需平衡,让社会生产供给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

3.2 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市场伦理观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在市场领域也有充分的体现,市场活动中作为参与者的市场主体将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秩序,构成一定的市场伦理规范。习近平市场伦理主要论述了市场主体等参与各方应该遵循的规范,即市场活动的“应当”之理。习近平市场伦理观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作用、政府宏观调控以及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伦理理论。

3.2.1 凸显市场主体作用的市场伦理

首先,习近平市场伦理观强调了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提出“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69]这种经济伦理观点认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回顾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的思路，我们不是照搬西方的激进经济发展方案，也不是采用其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教条主义，以独立自主的方式探索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在改革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也在不断改变，从最初市场的辅助性作用转变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最后转变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我们也在一直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认识是不断改进和深化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解决如何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利用效率，特别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将最小化的资源实现最大化的产出，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无可替代的决定性力量，能够促进、调配资源向最需要的领域流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市场伦理观凸显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主体地位。

其次，习近平市场伦理观强调了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70]市场主体联系着国计民生，联系着千家万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不容忽视的重要构成。同时，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也成为了我国宝贵的经济资源，在产品服务生产、扩大民生就业、提振投资消费、促进创新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保障。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众多的中小微企业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充分发挥了“船小好调头”的天然优势，一方面多措并举实现经营自救，另一方面科学布局生产和服务发展体系，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成为我国面对全球经济颓势仍然能够保持经济活力的基础。

另外，习近平市场伦理观强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71]市场主体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是经济体系的基本单元，对市场形势具备最敏感的触觉。正是因为市场主体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以科学合理的政策保障机制让市场主体具备生存、发展和繁荣的沃土，为经济发展积蓄基础力量。

3.2.2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伦理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科学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发挥好政府合理有度的宏观调控职能,习近平提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71]习近平清晰界定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强调了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作用,还要调动“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充分结合“两只手”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序性。通过政府发挥调控、监管职责,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竞争和发展,而且避免了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扩大需求就要及时扩大需求,需要调整供给就要及时调整供给,在正确的时机做出正确的选择,开准药方。

尽管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和监管是非常必要的手段,但是在此过程中,政府调控必须保证“合理有度”。习近平市场伦理观科学强调政府“合理有度”的宏观调控不容忽视,提出了“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为政府宏观调控明晰了职能边界。习近平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宏观经济和微观基础构成了一个相互刺激的体系,政府采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调节微观主体的活动和行为。习近平市场伦理强调了政府“科学的”、“有效的”调控职能,有助于避免市场资源配置的局部失灵等问题,规避市场内在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让政府充分发挥调节市场经济的作用,充分考虑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短期和长期的利益,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宏观调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有助于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规避了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问题。

习近平市场伦理观从市场角度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责任担当,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政府调控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72]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优缺点共存,如同双刃剑。虽然我国基本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不正当得利等不

良经济现象等制度内问题也亟待解决。因此经济发展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是不充分的，同时还需要加强政府合理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职能。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必须在规范的市场秩序下发挥作用，通过政府的有度参与，积极引导，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建设，积极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主动坚持诚实守信，规避由于制度规则不完善导致的失信行为。在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约束下，市场主体将更多的主动倾向于利他主义，逐渐抛弃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自利行为，促进社会成员都诚实守信。

3.2.3 破解政府市场关系的市场伦理

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堪称经济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我国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上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认识和破解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始终探讨的核心命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73]习近平市场伦理观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备中国的独特性，不可归于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也不能看作是绝对干预的管制经济，从其经济运行的本质上表现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的经济形态，所以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与西方主流经济伦理理论相区别，习近平市场伦理观以辩证法、两点论来看待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和“看得见的手”的政府之间有效协同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二者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既要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又要让政府发挥调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即有效的市场机制，有活力的经济主体以及有度的政府调控。既不能为了市场资源调配的决定性作用否定政府调控，也不能也以政府调控取代市场资源配置。市场经济规律赋予了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这一内在规律，并且以政府调控作用避免市场盲目性问题，同时保证政府调控的有度，既不能过多干预，也不能监管缺位，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最大化的效率和效益，从而构建完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市场伦理观破解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伦

理关系,充分肯定了有度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对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74]习近平市场伦理观认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核心在于明确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政府只对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进行监管,有度的监管就是既要管到位,又不能越界。习近平市场伦理观在更高层次上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破解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固化思路,推动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超越,为破解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世界经济难题提供了中国启示。

3.3 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分配伦理观

习近平分配伦理观认为,社会分配活动中的分配施动者和分配被动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道德关系,体现在分配过程和分配活动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全面解答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分配伦理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性问题,提出了分配伦理的价值和原则等。习近平分配伦理理论具体内容表现为社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彰显分配正义以及兼顾公平和效率。

3.3.1 体现全民共享的分配伦理

回顾我们党百年奋斗征程,始终把民生福祉、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重要实现目标,共同富裕也鲜明表现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应该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为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获得感”。^[75]习近平分配伦理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等伦理观点切合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人民谋福祉、谋幸福的历史使命,实质上这也是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目标,贯穿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始终。共享发展成果是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主旨。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分配伦理基础在于发展经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可分配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发展成功与否,决定于发展成果是否由人民所共同享受”。^[3]习近平分配伦理在发展理念上坚持了“人民至

上”，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于社会分配的首位，习近平认为改革和发展成果是由人民创造的，所以理应由人民共享。习近平分配伦理观倡导人民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把分配理论推进到了新的伦理理论境界。

习近平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64]，“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76]。习近平指出，“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进全球均衡发展”。^[77]习近平认为应合理支持安排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社会分配的新举措。民生福祉需要从普惠性和针对性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应保证社会公共服务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向群众提供必要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基本保障；二是面向特殊群众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包括提供工作机会和基本生活物资等。习近平指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8]为此，首先需要不断为群众提供健全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由于社会成员的家庭、工作、财富等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社会分配能力和分配结果的不同。在这种分配背景下，“理性人”的缺陷在市场机制中被进一步扩大，导致先天条件不足的群体在分配活动中公平性不足，处于劣势地位，长期必然会拉大贫富差距和阶层差距。所以要完善包括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生活保障服务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最大程度降低代际财富差距，为每个个体提供相同的分配起点，提供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参与机会。其次，由于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差异，也必然存在贫富差距，所以要重视群众的根本利益，将社会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内，保证发展成果共享的分配数量相对均衡。针对需要就业与生活困难的群体，习近平首次提出“社会政策要托底”^[76]，为群众提供最基本的就业机会与生活补助，让生活困难的百姓也能分享经济改革的成果。一是要推动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就业是人民群众的生存之本。一般来说，个体参与社会分配的能力取决于其就业质量。我国就业人口数量众多，结构性问题突出，必须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就业，确保获得参与分配的机会。如果无法实现社会成员充分就业，那么将导致其无法拥有初次分配的权利和机会，更加无法享受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习近平分配伦理理论也体现在了困难群众的扶持上。习近平提出，“在扶贫的路上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困难群众，精准的帮扶困难群众，制定精确的扶贫办法，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真正为群众着想，不断促进”。^[79]习近平分配伦理要求分配水平更加均衡，强调

了全民共享的分配伦理，全民共享涉及到的都是人的生存、尊严和发展的事务，都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大事。

3.3.2 彰显分配正义的分配伦理

习近平对于分配伦理做了很多阐述，体现了他对分配伦理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对分配伦理价值有着深刻的把握。习近平分配伦理强调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的伦理准则是分配正义。习近平在谈论我国分配领域的施政理念时，尤其强调了人民的中心地位。2012年，习近平在和国内外记者会面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80]习近平分配伦理坚持了“人民中心”的理念，这是其分配伦理的底色，这个基点成为分配正义的根本发展走向。

习近平指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81]习近平分配伦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分配的正义性，分配正义应首推权利公平，权利公平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约束，以法律形式保障群众平等享有社会发展成果分配的权利。而机会公平则是要保障人民群众不被历史、地理、社会等主观或者客观因素所约束和影响，能够平等享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习近平分配伦理观主张社会分配的起点、过程和结果都要做到分配正义，而且无论从分配的形式上，还是分配的内容上都要坚持分配正义的伦理原则。形式正义着重体现在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原则上，而分配形式正义的最终旨归在于实质正义的权利公平。

第一，分配的权利公平原则。习近平分配伦理观将权利公平放于三大公平的首位，习近平提出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就充分体现了权利公平，通过权利公平来推动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分配伦理观视域下的权利公平确保社会成员在财富分配上具备公平的主体资格和公平的分配保障机制。分配正义中的权利公平是分配正义的重点表现，也是习近平分配伦理理论的重要体现。虽然权利公平成为判定分配是否正义的衡量标准，但是分配权利公平在规避过度的贫富差距过程中也不是意味着平均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和权利公平必然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包括生育、高考、就业等广受关注的权利公平问题。就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实际来看，社会权利公平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二，分配的机会公平原则。习近平分配伦理观要求社会成员在升学、就业、收入等分配中享有平等的社会分配机会，不能受制于分配机制中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习近平指出：“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无法出头，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62]习近平分配伦理重视了分配机会，避免社会成员由于不利的主客观因素导致无法获取平等的分配机会，包括升学、就业、升值等平等机会，不能因为分配不正义严重损害了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共同享有，即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82]，这有力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机会公平的内涵。因此，习近平分配伦理所彰显的分配正义从本质上要求为社会参与者提供平等的机会，为每个努力生活和奋斗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尤其是对于先天弱势的部分群众给予一定的机会补偿。

第三，分配的规则公平原则。习近平指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83]分配规则公平是分配正义的基础和保障，由此才能保证分配结果的公平正义。如果在制定分配规则时就缺乏公平性，那么就从源头打乱了分配的正常秩序，影响了人民群众主动劳动的积极性。习近平分配伦理观体现了分配规则的公平性，保证社会成员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具备公平的分配标准以及公平的分配程序，杜绝分配中不劳而获的现象。

3.3.3 兼顾公平效率的分配伦理

习近平分配伦理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84]在习近平看来，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充分关注公平，同时也要考虑到效率。从本质上说，兼顾效率与公平是社会主义经济分配伦理的方针。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公平并不等同于各个经济主体具备完全相同的利益，而应根据参与要素合理衡量利益的分配。在我国过去的社会分配制度中，主张平均分配不但限制了生产力的进步，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而兼顾效率和公平则从本质上否定了我们过去经济发展中牺牲社会效率，

坚持绝对公平的做法。所以习近平分配伦理观认为,目前搞平均分配是不科学的,会影响效率的提高。

习近平分配伦理观认为社会分配应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其关键在于全面统筹处理分配公平和分配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也成为习近平分配伦理理论创新的一个亮点。分配伦理范畴中的公平和效率之间本来是矛盾的,效率侧重于社会经济效益,以社会财富作为衡量;公平则侧重于个人利益或者收益,以收入差距水平作为衡量。从公平维度来分析,假设将公平标准设定为收入和财富的平均,那么需要把个人的收入和财富都进行相同数量的分配,这就又导致了绝对的平均主义,势必会对社会群体开展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造成损害,最终阻碍经济发展的效率。从效率维度分析,假如绝对强调分配效率,而不重视公平,那么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将会进一步拉大阶层差距,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不利于财富上升通道的顺畅。忽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统一关系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习近平分配伦理认为,不能将公平和效率对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兼顾效率和公平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为创造更充分的可分配社会财富提供基础条件,而且有助于降低人和人之间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维护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分配伦理观所主张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国情的正确把握,是坚持发展生产力和提倡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伦理理念的具体体现,分配公平不但对经济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且通过效率提升促进可分配的物质财富增长,从而能够实现真正的分配公平。分配公平的前提在于机会平等,让社会参与各方都具备平等分配的机会,从参与分配的起点到分配结果的终点上都具备公正性。另外,社会分配水平允许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产生严重的贫富差距。

3.4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观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中包含了丰富、深刻的消费伦理理论,即在消费过程中以及和消费关联的行为活动中所体现的伦理价值。正确的消费伦理观要求消费主体在日常消费活动中遵循生态伦理道德,以正确的消费伦理观念指导消费对象在消费活动和消费过程中采用符合消费伦理道德的消费行为。消费伦理表征

着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消费伦理观主要表现在生态和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方面。

3.4.1 倡导生态和谐的消费伦理

人类的形成根植于自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自然界供给的资源,人和自然之间构成了生命共同体。我国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要构建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但是我们面临着大量的生态污染、气候变暖等严重环境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很难寻求现成的答案,因此我们应基于面对的现实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研究和探索,寻找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生态和谐发展之路。

习近平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成为践行者、推动者。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85]习近平认为,树立正确的生态消费伦理意识,需要全社会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因为人和自然既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也是一个伦理共同体。人类应树立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主动遵守自然规律和生态伦理规范,如此才能构建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体现了习近平绿色生态的消费伦理观。尤其是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关于传染病源等生物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类向大自然不断的过度索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自然生态,人类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虽然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但是对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却造成了不可逆的侵害。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野生动物立法形式治理滥食野生动物的消费陋习,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以正确的消费伦理观抵制病态的消费,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消费伦理观的重点体现。

习近平消费伦理观站在人类以及中华民族永续的发展高度,重新审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财富和经济社会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倡导生态和谐的消费伦理价值取向扩展了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习近平认为,人类社会的消费活动应该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原则,过度的消费主义是不利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

3.4.2 倡导简约适度的消费伦理

消费主义使人受到物的支配,过度追逐金钱,完全成为了物欲的奴隶,拜金、享乐等错误思想腐蚀了人的精神世界,摧毁了人的价值观。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群众的消费观念和习惯发生了很大改变。社会的发展要求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是也要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加之经济领域的扩大内需政策刺激了人们崇尚物欲消费,人们对奢侈浪费丧失了警惕性,传统的节约、简朴的生活美德逐渐被人们所淡化,社会消费更加推崇奢侈、超前、过度,炫富、仇富等不良倾向,不但对自然和环境产生了难以负担的压力,造成社会极大的浪费,而且使人民群众的传统美好的消费价值观扭曲,造成不良的社会消费风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勤俭节约”做了很多的论述,体现了习近平简约适度的消费伦理观。习近平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86]针对社会出现的餐饮严重浪费的不良现象,习近平从国家安全和消费正义的高度强调:“联想到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严重的浪费现象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要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87]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和整顿“四风”的相关规定,通过《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文件,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88]等,坚决狠刹讲排场比阔气、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消费伦理观主张群众应该继续发扬勤俭节约的美德,坚持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其消费观点也集中体现在他从严治党的实践中。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倡导简约适度的消费伦理,作为消费主体的个体或者群体实施消费行为时,在达成消费目标的同时,应该秉持简单、节约、俭朴的思想,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消费应保持在合理尺度,避免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的挥霍式糜烂生活。

3.4.3 倡导绿色低碳的消费伦理

人类的过度消费行为和活动将造成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必将导致自然界背负着人类消费的沉重负担。消费主义的目的通常忽略了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为了追求物品的象征性价值或者符号性价值,所以消费主义的理论逻辑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抛弃,伴随着这种消费方式的过度包装、一次性消费等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和高碳排放,给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习近平消费伦理观要求推动绿色消费,积极倡导以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为主要特色的正确消费方式,在全社会构建绿色低碳的良好消费氛围。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他指出:“要抓住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推进全面节约,加快消费转型,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89]习近平认为,推动绿色低碳的消费方式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体现了对经济发展和生态关系的正确认识,人类应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保护好与人类共存的生态,而绿色低碳消费目前来看则是正确对待生态环境的一种最优消费方式,让中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习近平绿色低碳消费伦理积极倡导生态和谐,推崇人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伦理价值,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倾向,倡导社会个体在消费过程中应考虑他人以及子孙后代的消费利益,在消费活动要求消费个体和社会共同体形成和谐的伦理关系。绿色低碳的消费伦理倡导群众节约自然资源消耗,采用正确的生活方式,降低 CO₂ 排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的低碳消费伦理呼吁绿色消费转型,建议以市场化碳交易模式改进环境权益的配置,积极提倡低碳排放的绿色消费习惯和理念,让社会所有的消费主体能够自愿、主动地参与到绿色低碳消费行动中,自觉选用低碳排放的消费模式,实现人和自然的生态和谐。

第4章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最本质特征。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成果上的重大创新,激活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时代生命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特质,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世界各国开辟经济发展新局面,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了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方面。

4.1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理论贡献

4.1.1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时代生命力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90]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思想武器,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历经几个世纪的历史实践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具备科学性和真理性,拥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迸发出了与时俱进的伦理品格,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特色鲜明的理论系统。我们在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时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伦理”这个名词,但是他论述了“道德是什么”、“人们如何进行生产”等和经济伦理相关的概念和内涵,认为伦理是经济的内在要素。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也应和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与时俱进,由此焕发出时代的生机。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充分依托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其中体现的经济伦理观点,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对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进行提炼和概括,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没有讲过、前人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重大经济伦理问题,从生产、分配、消费以及市场经济活动层面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构筑了内容丰富的经济伦理观,重点处理了生产和消费、市场和政府等相互关系问题。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驾驭能力,而

且为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赋予了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内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通过借鉴吸收马克思关于道德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论断,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价值、道义、社会等方面的伦理理论精华充分融合,形成的原创性经济伦理观,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要的行动指引,形成的新的理论创新,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点焕发时代生命力。

4.1.2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特质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基于中华文化精髓的吸收和借鉴以及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特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强国的科学指引。在我国迈进发展新时代的背景下,习近平紧紧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把握住经济发展的主线,将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充分践行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经济关系不再限制于“经济”范畴的抽象,体现了更多的伦理关怀,人的伦理特质贯穿于经济建设实践活动中。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融合了我国的政治特征、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属性、多元文化脉络以及生态文明,体现了“五位一体”全面系统化发展的特征。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涵盖了践行人民创造的生产伦理观、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市场伦理观、注重公平正义的分配伦理观以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观,其丰富的经济伦理意蕴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为我国持续推进各领域深化改革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了可遵循的经济伦理理论,在中国人民积极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引作用,是全面尊重客观规律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经济思想成果,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创新的又一个理论高度。所以,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显著效用就是体现在彰显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特质方面,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思想指导。

4.1.3 理清了经济和伦理之间关系

中外思想研究史始终把经济和伦理关系的问题作为研究焦点,包括我国的“义利之辨”论题、古希腊对“善和物欲”关系的论题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一直想

将道德因素从经济范畴内去除的趋势很明显。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矛盾，并借用国家和民族至上的名义，反对自由贸易思想，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因此，他们在探讨利己主义和经济自由时，认为道德应该从经济研究的领域中排除，这就是“斯密问题”。在“斯密问题”前，经济学一直被当作伦理学科的分支而存在，经济学和伦理学并没有被完全割裂成毫无关系的两个独立学科，二者同属于一个研究范畴。自从“斯密问题”产生后，经济学研究更加偏向于实证主义，导致经济和伦理观点逐渐对立，二者关系也被割裂。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形成后来看，所谓“斯密难题”不能看作是一种难题，甚至都不算是问题。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从底层逻辑出发，表明了经济和伦理之间并不是相悖的命题，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密切关联性。习近平经济伦理观认为，将伦理从经济思想范畴中剔除不符合经济的内在规律。首先，经济发展中蕴含着伦理观点。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伦理也是经济的重要属性，经济决定伦理的走向。经济制度不同，其蕴含的伦理道德也存在差异，伦理道德作为经济的内生因素必然会影响经济活动。从经济和伦理的本质上看，无论哪种经济活动都包含着与其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这是人作为经济主体的一种价值追求，所以经济和伦理可以看作为一个统一体。其次，经济和伦理之间互补，无法分割。虽然目前经济和伦理分属不同的学科和研究范畴，但是其本质的内在关系决定了其能够在内部实现互相渗透。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不能单纯是“经济人”，或者单纯是“道德人”，否则就是人格分裂，伦理道德是服务于人的一种价值追求。最后，经济是否合乎伦理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准则。经济伦理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伦理或者符合伦理的行为，不仅意味着经济主体存在着符合伦理的行为，亦即“经济伦理”，而且还暗示着经济主体可能存在着不符合或违背伦理的行为，亦即“经济不伦理”。在评价人类经济行为活动中，我们通常选择传统伦理学中的善恶标准作为评价依据，而评价经济是否合乎伦理标准则在于经济行为的目的和功能是否服务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那么可以得出经济违背伦理就是由于经济活动偏离了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将创造社会财富或者盈利作为唯一目的，忽视了创造社会财富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的。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从国家思想意识层面深刻解答了经

济和伦理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经济建设和伦理道德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进行纠偏，从本质上维护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伦理底色。

4.2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实践价值

4.2.1 补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社会存在”的制度形式，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一般都具有着和其“共生”的人性偏好和价值取向。这种人性偏好和价值取向形成了经济伦理规范的基石。^[9]我国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经 40 多年发展，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活力十足。伴随着稳步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在重要的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获取了决定性成果，但是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现，需要以更先进的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具备高效率，其伦理基础让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寻求了共同点，二者的协调融合是合乎社会道德。我们党也一直致力于将市场经济制度规则和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形成协调和融合的理想状态，所以需要一种能够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达成统一的人文基础和伦理环节，而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正确的道德精神与伦理准则。

另外，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破解了政府和市场的伦理关系，既认可了市场资源配置的地位，又解答了何为政府有度的宏观调控职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的结合，这对经济主体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正确的伦理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刺激社会本身形成合理的伦理调节机制，有助于避免经济活动中市场存在的盲目性问题以及市场调节的滞后性问题，让政府调控职能具备边界意识，既要调控到位，又要调控有度，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协调一致，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4.2.2 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硕果累累，但是发展中面对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雾霾严重、水土流失等很多严重问题也非常复杂，如何正确认识和处

理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联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和道德伦理关系给出了正确的解答。

第一，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类面对自然时认清自身位置，为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理清了关系，从根源上深化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准则，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伦理导向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的发展；在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指引下，中国生态环境取得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变化，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突出。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了34.8%，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断面比例达到了84.9%。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达到18%，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得到了很好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生动展现。第二，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视社会经济道德，将伦理和社会经济建设融合。所以说，时代性和实践性充分地体现在了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中。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中蕴含的消费伦理观点要求我们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降低社会活动中的享乐、拜金等不道德的负面行为，让群众具备正确处理经济和道德之间关系的方法和方式，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三，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有助于凝心聚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完美地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经济伦理观点融入到经济思想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了经济发展和道德伦理的统一。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提倡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培养人民群众高尚的道德修养，有效抑制人民群众对不正当利益的追求，促进社会和谐，为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4.2.3 助力世界各国开辟经济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围绕如何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做了科学论断，他创造性提出，“应该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创造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

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92]习近平经济伦理观具有全球化的视野，是为助力世界各国开辟经济发展新局面而贡献的“中国智慧”。

面对着现阶段世界发展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包括枯竭的自然资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等，全人类都应参与到习近平提出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行动中，助推全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指引下，我国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等先进理念运用于中国式经济建设全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道路，这得益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正确指引，这为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对于陷入经济发展困境的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中国式发展方案。

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等国情都不同，所以其发展道路也是各不相同。我国在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指引下，走出的中国式发展道路经过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充分利用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指导作用，可以为全球各个经济体面对各自的发展问题提供借鉴指导思路，从而促进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繁荣向好。让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态势实现全球经济的联动发展，让全世界经济更平衡、更稳定地发展。习近平提出的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为我国的扶贫事业提供了伦理基础，使全球经济增长具备更大的包容性。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得益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正确指引，所以应将这种先进的经济伦理思想指引作用应用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为 global 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习近平经济伦理观能够助力世界各国从实际出发，走出发展瓶颈，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总 结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关于经济伦理的观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并融合了中国优秀文化精髓。本文关于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研究，从形式上看是从伦理角度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伦理意蕴；从实践意义上则是通过研究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指引。践行人民创造的生产伦理观、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市场伦理观、注重公平正义的分配伦理观以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观，其中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经济活动视域下的伦理意蕴。这种伦理观归根到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时代生命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理清了经济和伦理和谐的关系的形成，从而补充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世界各国开辟经济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经济伦理观作为全新的理论命题，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性研究，通过对习近平经济伦理观意蕴的阐释，为学界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鉴于本文是初步的研究探索，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研究还有待开展持续性探索，尤其是要进一步拓展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内涵，丰富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现实效用的研究。在未来的研究探索中，还是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背景，持续挖掘习近平经济伦理观的深刻内涵以及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4] 杨臣华. 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J]. 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2017(11):19.
- [5] 龚天平，王世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经济伦理意蕴[J]. 南海学刊，2019,5(03):6-16.
- [6] 王坤岩，臧学英.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天津实践[J]. 理论与现代化，2022(03):40-50.
- [7] 何军明，孙华玉. 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J]. 理论导报，2023(08):4-6+11.
- [8] 杨振家. 习近平关于科技强国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实践品格[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03):8-14+53.
- [9] 牛小侠，杨倩倩. 习近平科技伦理观的三重内涵及其当代价值[J]. 学术交流，2023(04):16-26.
- [10] 胡洪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经济家，2023(12): 16-25.
- [11] [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2] 靳凤林. 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19(01): 35-39.
- [13] 乔洪，武孙丽. “两手论”及其经济伦理意蕴[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6(06):65-73.
- [14] 赵晓宇. 伦理道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及其启示[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5(08):91-93.
- [15] 刘紫瑶. 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意蕴及现实意义[J]. 农家参谋，2019(05):227+264.
- [16] 李婕妤. 伦理经济学：市场经济中的伦理思维和道德考量[J]. 知识经济，2020(24):9-10.
- [17] 张彦，顾青青. 习近平谈市场主体发展[J]. 中国经济评论，2022(12):8-12.
- [18] 姜涛. 习近平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基于供需视角[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38(04):14-21.
- [19] 方宇菲. 新公共利益理论的逻辑——市场失灵、公共利益与政府监管的关系阐述[J]. 经济论坛，2023(11):44-51.
- [20] 党方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7(05):1-8.
- [21] [俄]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习近平：正圆中国梦[EB/OL]. http://www.ccps.gov.cn/designated_topics/zyzgm/201602/t20160225_73633_1.html，2016-02-25/2018-10-01.
- [22] Francisco Urdinez, Gilmar Masiero. China and the WTO: Will the Market Economy Status Make any Difference after 2016[J]. Chinese Economy, 2015,48(2).

- [23] Grzegorz W. Kolodko.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Economy of China's Rise[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131.
- [24] 强以华. 经济伦理与分配正义[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8(04):101-106.
- [25] 刘喜珍. 分配正义视角下的代际利益伦理原则研究[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8(01):62-66.
- [26] 王立. 应得和工资——应得作为分配正义原则的解释性运用[J]. 社会科学辑刊, 2018(04):107-114.
- [27] 孙春晨.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阐释[J]. 中州学刊, 2021(10):87-92.
- [28] 阳芳, 杨小钵. 收入分配伦理底线的原则与测度指标[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6):55-66+169.
- [29] 王竹君.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意蕴和实现方式[J]. 道德与文明, 2023(03):14 -23.
- [30] 钱周伟, 丁粮柯, 王超. 关于市场分配关系: 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J]. 实事求是, 2023(01):5-14.
- [31] 彭敏. 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伦理意蕴[J]. 中国商论, 2024(01):37-40.
- [32] 乔洪武, 张江城. 共享经济: 经济伦理的一种新常态[J]. 天津社会科学, 2016(03):93-98.
- [33] 杨卫军. 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哲学底蕴[J]. 学术论坛, 2018,39(09):20-24.
- [34] 胡立法, 陈珊.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经济伦理观[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9(01):5-13.
- [35] 孙莹, 孟杰. 生态伦理视域下低碳经济实现路径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9,22(04):134-135.
- [36] 古璇, 王雪滢. 绿色消费的践行路径——绿色消费伦理系列研究三[J]. 大陆桥视野, 2020(10):41-43+46.
- [37] 汪淑娟. 消费主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1(06):145-151.
- [38] 何建华. 节俭消费伦理的时代意蕴[J]. 伦理学研究, 2021(03):105-110.
- [39] 陈首珠, 郝瑞霄. 有关消费异化与消费伦理的思考[J]. 北方经贸, 2021(02):18-20.
- [40] 张尹. 新时代中国生态经济伦理的问题、误区与应对[J]. 云南社会科学, 2022(01):84-90.
- [41] 路雪莲. 共享经济发展下的消费伦理转型[J].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21(04):70-76.
- [42] 刘建伟, 王彤. 习近平生态伦理观内涵探赜[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23,46(05):3-8.
- [43] [美]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等,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44] Wagner Helmut. On the (non-)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ies[J]. The Chinese Economy, 2019,52(1), 1-23
- [45] 宁吉喆.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及机遇挑战[J]. 全球化, 2023(06):5-12+134.
- [46] 邸乘光.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9-27.

- [4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 [48] 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88.
- [49] 蔡万焕.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对唯物史观的发展[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7):12-17.
-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1] 邓小平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52] 江泽民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53]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54] 段宜廷. 儒家经济伦理: 从荀子礼学谈起[J]. 孔子研究, 2018(06):37-45.
- [55] 徐雪野. 孟子兴农思想的伦理意蕴与时代价值探赜[J]. 中国文化与管理, 2022(02):228-237+265.
- [56] 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 中国青年报, 2014-05-16.
- [57]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0.
- [58] 习近平. 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N]. 人民日报, 2016-05-03.
- [5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60]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61] 王祖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体系框架—新的经济思想体系: 科学内涵、体系框架和主要内容[J]. 上海经济研究, 2018,(6):51.
- [6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275.
- [63] 任仲文. 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M].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 [6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35.
- [65] 王阁. 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的构建及其价值意蕴[J]. 宁夏党校学报, 2024,26(01):33-43.
- [66] [美]托马斯·彼得斯, 罗伯特·沃特曼.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等,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67] 二十大报告摘登: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J]. 西安工程大学学报, 2022,36(06):45.
-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69] 杨臣华. 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J]. 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 2017(11):19.
- [70]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J]. 社会主义论坛, 2020(08):4-6.
- [71] 刘树升. 弘扬新时代徽商精神研究——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22(01):10-13.
- [72] 张志明, 张俊伟, 王惠宇.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J]. 中国纪检监察, 2023(17):62-63.
- [73] 蔡奇.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J]. 党建研究, 2023(10):4-11.
- [74] 佟家栋, 鞠欣, 张千.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12.
- [75]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2
- [7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77] 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的主旨演讲[R]. 北京: 2022.
- [7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79]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80]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17.
- [8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75
- [82] 李维. 习近平重要论述学习笔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83]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5.
- [84] 张亮.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回顾及展望[J]. 中国发展观察, 2019(01):23-29.
- [85] 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 人民出社, 2014.
- [8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选编[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245.
- [87] 伍安春, 丁发英. 习近平关于勤俭节约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4(03):18-27.
- [88] 张鹏虎, 赵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艰苦奋斗精神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02):15-19.
- [89]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 理论导报, 2024(01):19.
- [90] 顾海良.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 红旗文稿, 2021(07): -12+1.
- [91] 郭忠义, 侯亚楠. 从制高点到地平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底线探析[J]. 社会科学文摘, 2017(06):93-95.
- [92] 高帅. 从马克思的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逻辑——基于《共产党宣言》与《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等文献的理解[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7(02):62-69.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李东，方前移. 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智能生产时代的启示研究[J].绥化学院学报,2024.（已录用）

致 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的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接近尾声。在此，我满怀感激之情，向所有给予我关心、帮助和支持我的人致以我最真挚的谢意！

首先，我衷心感谢敬爱的导师方前移教授。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不仅给予我悉心指导和鼓励，也非常尊重我个人的想法，引导我走规范的学术道路，摒弃不切实际的思想。本篇论文从选题、框架构建、论文写作、文献查阅以及反复修改的每一个环节与细节中都凝聚着导师的智慧和心血。方老师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造诣和高尚的师德风范深深影响着我，将指引我未来前进的道路，让我受益终身。感谢师门学长、学姐、学弟和学妹，对我论文提出的细致耐心的建议，并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让我感受到师门集体的力量和温暖，使我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注重团结和友谊。

其次，我要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各位尊敬的老师。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是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兼收并蓄，让我不仅学到了扎实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而且为我打开了广阔学术的新视野，更是让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泛泛而谈，它是时刻在我们身边，是实践的理论，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强有力武器。同时我要感谢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在研究生学习中给予的帮助与鼓励，我们共同学习、一起参加活动，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组队参加了第八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获省级银奖，在高教主赛道获得铜奖。

此外，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供助研助管岗位，这些岗位对我个人能力提高，产生了非常大的帮助，这些经历是我今后工作的提前预练，是对自己研究生学习理论的实践。我还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图书馆、学习中心等安静且很有氛围的学习场所。这些场地丰富的学习资料和良好的学习环境让我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不断拓宽自己视野、提升干事业的能力。

最后，我要感谢深爱我的家人们的陪伴。在我考研时，我的家人就一直尊重我的选择，支持我的脱产求学的决定。在我研究生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给予我竭力的支持和关爱，无怨无悔，辛苦劳动，是我求学之路最坚实的后盾。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才能专心致志于学业，敢于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感谢尊敬的各位论文评审专家，不辞辛劳的阅读和评审我的论文。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对我来讲至关重要，是我论文得以突破和完善的关键。对于您们悉心指导，我将铭记于心；宝贵建议，我将虚心接受。您的专业评审让我获益良多，衷心感谢您的付出与支持。

谨以此文，向所有支持和关心我的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祝愿你们健康平安每一天，幸福美满每一年！